

机 密

编 号 \_\_\_\_\_

# 上海第一钢铁厂 工人队伍状况的调查

一九七三年五月

# 目 录

- 一、上海第一钢铁厂发展概貌 ..... (1)
- 二、平炉车间老工人情况调查 ..... (5)
  - 附：四个老工人家庭经济生活的调查 ..... (12)
- 三、第二转炉车间五十六个“海塘青年”的情况调查 ..... (19)
  - 附：如何做好犯错误的人的转化工作 ..... (27)
- 四、钢板车间青年工人情况调查 ..... (33)
  - 附：钢板车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情况 ..... (39)
- 五、上钢一厂大专毕业的知识分子情况调查 ..... (45)

## 上海第一钢铁厂发展概貌

上钢一厂是一个具有三十五年历史的老厂，它的前身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由日寇筹建的“中华制铁株式会社吴淞工场”。一九四三年开工生产时，有十五吨平炉一座，职工二百八十三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从日寇手里接收过来，并与上海钢铁商人合股修复，改名为“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厂”，主要设备仍然只是平炉一座。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为二千六百八十九吨，主要产品是四吋普通炭素钢锭。全厂职工人数最多时有三百三十二人，其中绝大多数原来是当地的贫苦农民，也有少数失业工人。

解放后变为公私合营企业，改名“上海第一钢厂”，一九五七年三月改名“上海第一钢铁厂”。一九五〇年添建转炉二座，一九五一年扩建平炉一座，到一九五三年钢产量达九万二千八百三十一吨。职工人数从解放初到一九五三年，共增加一千四百十八人，其中除五十余名是解放初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以外，有工厂发展征地进厂的农民二百十九名，社会就业人员八百四十余名。

三大改造时期，又经过几次改建和扩建，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五六年的钢产量为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七吨，主要产品仍为普通炭素钢。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新增加职工一千二百十人，来源有完成宝成铁路建设工作后回沪的工人和失业工人、转业三轮车工人、外地回沪工人等。

三年大跃进时期，上钢一厂新建了二转炉、三转炉、高炉、轧钢、无缝钢管等车间，生产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

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了上钢一厂第二转炉车间，鼓励钢铁工人“要好好干，大有可为”，成了上钢一厂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到一九六〇年，钢产量已达七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五吨。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共新增职工二万一千零二十七人。其来源：

轻纺、铁路运输部门	八千零十六人
三轮车工人和其他转业人员	三千六百八十一人
里弄妇女	四千七百七十七人
社会青年	一千零七十四人
临时工	一千五百五十三人
复员军人	一百九十六人
大中专毕业生	九十三人
其他	一千六百九十七人

一九六一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上钢一厂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全厂精简、转业人数达五千人左右，钢产量也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降到四十九万八千四百七十五吨。一九六四年开始回升，到一九六五年钢产量突破一百万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上钢一厂又有新的发展。厂的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全厂占地面积达四千亩，有十八个部门，即平炉、二转炉、三转炉、高炉、轧钢、无缝钢管、钢板、铸造、石灰、耐火材料十个车间，以及运输部、机电部、建工科、中心试验室、行政科、卫生科、供应科、厂部各科室等。钢产量不断上升。一九七二年达一百六十二万吨，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五百八十倍左右，占全上海钢产量总数的五分之二。钢的品种也增加了很多。解放初只能炼一种，一九六〇年可以炼六十七种，一九七二年可以炼二百七十三种。

目前，全厂共有职工一万六千四百十九人（其中女职工一千九百四十四人），此外还有四类分子八十四人。为解放前夕职工人数的五十一倍左右。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年末，全厂新增职工三千九百零六人。其中：

六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	一千零二十九人
七〇届初中毕业生	一千一百三十六人
七二届初中毕业生	四百二十七人
复员、退伍军人	四百四十七人
市郊农场知识青年	五百六十六人
川沙插队落户知识青年	一百人
因新建车间征地进厂农民	一百四十一人
六六至六八届大、中专毕业生	六十人

全厂共有党员一千七百七十九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点八三；团员一千五百八十一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九点六。现有车间和厂部组室以上的干部一百四十八人，其中从工人中提拔的有一百零五人，复员军人十六人，下放的机关干部十七人，学生十人。脱产技术干部（指有技术职称、专职从事技术工作的）三百六十三人。文化大革命中有二十名车间以上领导干部输送去外地或外单位。

职工的文化程度：大专毕业生七百六十五人，高中和中专毕业生二千零五十四人，初中毕业生五千三百二十七人，小学程度六千三百九十一人，文盲、半文盲一千九百六十六人。

老工人退休情况：从一九五三年初到一九七二年年末，共退休九百三十八人，其中一九七〇年退休七十九人，一九七一年退休六十人，一九七二年退休一百三十七人。目前，已到退休年龄，但尚未退休的共二百七十七人。

最近，我们对上钢一厂平炉、二转炉和钢板三个车间工人队伍情况作了重点调查。平炉车间系上钢一厂的前身，现有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进厂的老工人四百九十一人，是全厂老工人最集中的—个车间。二转炉车间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现有一九五八年进厂的职工近七百人。钢板车间是一九七一年新建的车间，有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工人六百多名，是全厂青年工人最集中的—个车间。通过这三个车间的典型分析，大体上可以反映目前老年、中年、青年三代钢铁工人的状况。另外的几个专题，则是从一些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工厂的面貌，对了解整个工人队伍状况起—定的补充作用。

## 平炉车间老工人情况调查

平炉车间是上钢—厂最老的一个车间。一九三八年筹建，一九四三年投产。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为二千六百八十多吨，相当于现在车间三天的产量。

平炉车间是全厂老工人(平均工龄在十八年以上)最集中的—个车间，现有一九五七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四百九十一人，占车间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绝大多数老工人出身很苦，其中：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有三百九十人，中农、摊贩、职员、手工业家庭的八十一人，只有二十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些老工人经过二十多年党的教育，经历了解放后各次政治运动的考验和锻炼，绝大多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 老工人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 —、阶级斗争的依靠力量

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里，有的做过长工，有的还讨过饭，亲身受过“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作了国家主人，有强烈的翻身感。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车间里—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全车间—百三十七名党员中，老工人占—百二十名。目前担任“九大”代表、厂党委常委兼政治部副主任—人、平炉车间总支书记—人、支部书记四人、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三十八人，老工人中先后进驻上层建筑担任工宣队员的有九十多

人，其中一人任交通大学工宣队政委。原车间总支副书记、现任冶金局党委委员吴龙根，是老工人中优秀的代表之一。吴是贫农的儿子，解放前，一家九口，只有一亩田，无法糊口，跑到上海打铁店里当学徒，受尽老板的虐待。解放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同车间里几个老工人一起，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七年初，社会上刮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厂里有人召开“补发工资”大会，他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气愤，坚决认为不能丢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去搞“补发工资”，他和有觉悟的老工人一起责问会议主持者“造谁的反”？向参加大会的群众宣传“搞什么补发工资，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千万别上阶级敌人的当”。许多受蒙蔽的群众纷纷退出会场，返回生产岗位。后来，吴被推上车间革委会的领导岗位，负责抓生产工作。他为了抢修设备、设计安装简易余热锅炉，费尽心血，熬夜劳动，放弃轮休，和群众一起战斗，工作搞得比较出色。一九七一年五月，吴龙根因工作需要调局工作后，坚持定期回厂劳动，找艰苦的工作干。群众说：“吴师傅当‘官’不象‘官’，是我们信得过的带头人。”象吴龙根那样的老工人，在车间里还有很多。例如：当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刮得最厉害的时候，车间里的部分临时工、外包工离开了工作岗位，石灰、锰铁等辅助材料供应中断，平炉生产眼看就要停下来。老工人、党员王兰芳、江恒余等，挺身而出，坚决表示：“没有石灰，我们去拖；没有锰铁，我们去扛；没有人，我们一人要顶二人用，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平炉生产一分一秒不能停。”在他们的带领下，广大老工人纷纷行动起来，拖的拖，拉的拉，扛的扛，把各种原材料供应到炉前，保证了平炉正常生产。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车间里有百分之九十的老工人，自觉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平炉车间没有停

过一天产。

## 二、生产斗争的坚强骨干

目前，在平炉车间担任工长、总工长、值班主任、炉长和组长的十分之九都是老工人，提拔为工人工程师的有三人，工人技师十六人，工人技术员三人。老工人王涨法在旧社会里是一个替外国人拾<sup>高</sup>尔夫球的穷孩子，母亲病死在难民所，父亲被日寇打伤致死。一九四七年王投考上钢一厂时，要二人扛四百斤生铁，在场地上跑一圈，脚力不好，身体摇晃，就不能录取。王进厂后，抬抬扛扛，累死累活，仍不得温饱。解放后，王涨法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干劲很足，说：“跟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有一股猛劲。”他勤学苦练，刻苦钻研技术，二年后，由一名普通操作工，成了一名熟练的炉长。大跃进中，只读过半年书的王涨法又被提拔为工人工程师。目前，王掌握了一百二十多种的冶炼技术，能冶炼好几十种合金钢。许多老工人在生产上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生产上出事故，他们冲得上，顶得住。平炉每逢大修、中修，老工人就主动组织突击队。最危险、最困难、最艰巨的劳动，大都是由老工人挑起来。就拿平炉中修来说，为了缩短修炉时间，一千三百多度的格子房，炉子一停，有些老工人就头顶石棉、湿麻袋，不顾辐射热刺得睁不开眼，透不过气，双手痛得从手指尖直刺心窝，轮流冲进炉内去修理。年过半百、患有严重高血压的邱志道，领导上照顾他到锅炉房搞轻工作，但是每当平炉大修、中修，他都主动请战，积极投入战斗，干起工作来，一刻也不休息，群众说他是“不晓得疲劳的人。”

### 三、教育青年工人的好老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车间里新增加了二百零七名青年工人。看到一批批青年进厂，许多老工人回想自己在旧社会进厂的遭遇，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促使他们精心带好青年工人。老工人主要从三方面对青年进行教育，培养青年工人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 (1) 进行回忆对比阶级教育。

小青年进厂，老工人在车间党总支的领导下，都要对他们进行厂史、车间史的教育，并以切身的经历，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对青年工人进行阶级教育。一九四七年进厂的老工人侯府祥是贫农出身，九岁死父，旧社会兄弟三人养不活母亲一人；新社会，他一人养四口，生活过得很好。两种社会的不同生活，他体会很深，经常把自己的家史、自己经历过的车间发展变化讲给青年工人听：“解放前的钢铁厂，柏油桶是洗澡堂，劳动保护只有炉前取样工人才发一只手套，生病、受伤踢出厂，拿的工资只够吃苞米咸菜汤。现在你们一进厂，就发一百多元一套的劳动保护用品，还有厂校、剧院、球场、游泳池、医院、食堂、俱乐部、洗澡房、夏天还供应营养菜、冷饮料。”老工人的这些回忆对比，使广大青年体会到在毛主席领导下，当一名炼钢工人无比幸福。例如：青工王文兴，进厂后，不愿在高温车间劳动，工作不安心，老师傅批评小王是上班象鸭子，来得迟；下班象兔子，溜得早；工作时候象猴子，玩劲足，干劲差。后来，经过老工人韩桂松向他反复讲厂史、车间史，还邀他父母、亲戚一起给小王讲家史。这样激发了小王的阶级感情，劳动态度显著改变。

#### (2) 进行组织纪律教育。

不少刚进厂的小青年，往往自由散漫。有些小青年，上班看电

视，下班捉蟋蟀，工作吊儿郎当，很多老工人见此情况，都能主动耐心帮助教育小青年。有些小青年，开始听不进去，还说：“蹲在厂里，好象小鸟关在笼子里，没有自由。”老工人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新旧社会两种劳动纪律的根本区别，讲社会主义企业劳动纪律的性质和必要性，启发青年自觉遵守。许多青年工人在老工人反复耐心教育下，逐步培养了组织纪律性。

#### (3) 进行艰苦朴素的传统教育。

老工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对青年工人教育很大。许多老工人针对一些小青年平日大手大脚，不爱惜国家财产的大少爷作风，经常进行艰苦朴素传统教育，并以实际行动教育青年，效果更为显著。保温帽小组的几位老工人看到渣盆耳子经常损坏，坏了一副耳子，渣盆就报废了。他们就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动手修理，节约渣盆。一年来，他们为国家修好渣盆一百八十多只，节约了二十一万六千元。许多老工人，长期战斗在钢铁战线上，成千成万吨钢经过他们的手冶炼出来，输送到全国各地。但是，这些老工人连一只废螺丝钉，一段废铅丝也不放过，日积月累，收集了大量废钢铁。青年工人在老工人带动下，动手拣废铁，单乙班工人两年来就为国家回收了废钢铁二百多吨。

### 目前老工人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主要是领导如何进一步提高老工人的继续革命觉悟和政治、文化、技术水平。

#### (1) 提高文化水平

老工人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小学文化水平的有三百多人，文盲和半文盲有九十多人，两者合计，占老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通

过一九七二年扫盲，有二十二人的文盲帽子。有些老工人文盲状态所以长期没有解决，除年龄大、记忆力差、家务重、开会多等原因外，主要是由于领导对老工人文化学习不够重视，措施不及时，业余文化教育工作不得力，使得扫掉文盲的没有及时巩固和提高，文盲又回潮。还有部分老工人认为政治学习要认真参加，这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文化学习是私人的事，学习不学习关系不大，因此，文化程度提高不快。老工人袁文义，原是文盲，十几年前就摘了文盲帽子，达到小学三四年级文化水平，以后就没进步，原因是，当时学文化目的仅仅是为了看懂地名、帐单，目的达到了，学习文化劲头就差了。少数老工人有迫切学习文化的要求，他们认识到文化低，对政治学习带来一定的困难。老工人吴玉奎很想学习，买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订了《红旗》杂志，但由于识字不多，句子读不懂，感到很着急。每次准备大批判发言，都要花很大劲。老吴师傅说：“如果有了文化，学习就有了自由。”对这些老工人，很需要继续办好业余学校，组织他们学文化。

### (2) 提高技术水平

车间里五个老工人炉长，只有高小文化水平，要炼新钢种，困难也很大。一次，试炼一〇六钢，在厂、车间技术部门指导下，“一炮打响”。以后，要求各炉长单独操作，就出格，原因是新钢种配方复杂，炉长文化低，化学元素符号记不住。随着我国炼钢事业的发展，新钢种越炼越多，技术要求越来越复杂，困难会更大。文化低，不学习新技术，凭老经验办事，也容易产生自满。炉长李金祥，是个半文盲，不学习新技术，凭自己的老经验办事，人家向他提意见，他说：“我当炉长我当家，我炼的哪一吨钢没有卖出去？”

在文化大革命前，车间曾组织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技术员给工

人上业余技术课，老工人反映很好。他们希望继续采取有效方式，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帮助他们提高技术水平。

### (3) 提高继续革命觉悟

老工人中还有少数人，在旧社会经历复杂，旧意识浓，解放二十年来，又放松自我改造，表现很差。对这部分人，领导对他们教育帮助重视不够。乙班精整小组，是个后进小组，全组十六个工人有九个老工人，其中七个老工人的情况是：小组长嵇慈孝，解放前当过伪自卫队员，拜过老头子；副组长陆生康，解放前夕在台湾受过训，海南岛战役中被我俘虏；桑应清是定性不戴富农帽子的人；陈鸿忠是开除党籍的犯错误干部；张进根当过伪警，拜过老头子，解放后盗窃国家财产，受过纪律处分，目前还常讲怪话，发牢骚。还有二人虽无政治历史问题，但思想落后。在这个小组里，正气不抬头，邪气很嚣张，每天八小时工作可空余二、三个钟头，不是打瞌睡，睡大觉，就是吹牛皮，讲女人经。小青年薛景成，刚进这个小组时，还有些朝气，能够参加青年突击队活动，以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越变越差。对这个长期处于后进的小组，支部领导不够关心，二年来没有去过一次，成了车间有名的“西伯利亚”（指边远没人管）。支部领导最近已开始重视。另外，老工人中也有一部分人，过去表现较好，由于主观不努力，逐渐消极起来。党员炉长徐顺兴，今年五十一岁，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本人七级半工，工资一百十四元，爱人在上棉八厂，每月八十多元，两个孩子，女儿大学毕业，儿子七二届毕业分配工厂。徐存在技术、工资、年龄“三到顶”思想，革命意志严重衰退。交党费，他嫌负担“重”；买《毛选》，他说“我又不识字，不能拿钱买几个字来吃”。七〇年整党学习，他请“病假”避风头。对这样的老工人，领导也没及时帮助。



## 附：四个老工人家庭经济生活的调查

我们调查了四个老工人家庭的经济生活情况：

周道富，解放前苦大仇深，解放后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拥护党的方针政策。

周见根，解放后翻了身，但因子女多，经济仍然困难，子女就业后家庭生活又迅速上升。

沈炊连，目前经济仍较困难，但由于发扬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生活方面安排得很好。

江恒余，由于疾病，经济一度困难，得到国家补助后又逐步好转。

### 周道富

周道富，机动组组长，共产党员，四十七岁，江苏睢宁县人。

周道富的父亲生了七个孩子，在旧社会，家里只有九分田，生活难以维持，经常逃荒。周道富的大哥八岁帮人织布，每天劳动到深夜，伤了身体，二十岁就吐血。二哥帮人挑水，体力消耗过度，十九岁时也吐血。三哥现在在本厂劳动。周道富排行第四。两个妹妹，一个在安徽窑厂工作，一个在三个月时就给了人家，一个弟弟小时候就病死了。

周道富是在他父母逃荒到泗洪县时出生的。六岁时又跟父母逃荒到东海，一家人沿途讨饭，弟弟由于吃了讨来的已经变质的食物，当夜得病死去。在逃荒途中，一个出生才三个月的妹妹，因为养不活，

给了人家。全家到了东海后，讨了三年饭。周道富九岁时为地主放猪，一年工资三元。冬天没有鞋穿，赤着脚去赶猪，脚被刺得鲜血直流。

解放了，周道富在一九四九年九月来上海，挑柴卖过活。五〇年四月，经吴淞民政科介绍参加修海塘，后到附近工厂当临时工。五六年一月，吴淞民政科介绍他到上钢一厂工作。现为五级工，工资七十七元八角。

周道富于五二年结婚。爱人陈素珍，原在吴淞搬运站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服从组织安排，退职回家，没有一点怨言。六六年到烟糖公司当服务员，现在工资四十三元五角。

周道富有五个孩子，大儿子六九届初中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农场工作，现在学兽医，工资三十二元。女儿在交大附中读书，二儿子在吴淞三中读书，第四、第五个孩子在读小学。

六九年十一月，周道富的岳母去世，十二月大哥去世，七〇年二月二哥去世，七〇年四月大孩子下乡。在这段时间，接连要花钱，因此在孩子去黑龙江时，向厂里借了一百元，厂补贴二十元，向私人借了五十元，爱人向工作单位借了三十元。这笔钱，由于爱人在工调时补发了工资，孩子走上工作岗位后寄来一百六十元，已经全部还清。

周道富家住吴淞，房子由“滚地龙”改成小草棚，由小草棚翻成大草房，七一年五月又翻造成为瓦房，有四十二平方米，住得比较宽敞。这次翻造花去七百元，钱是借来的，已陆续还去一部分，尚欠三百元。家中有五斗橱一只，大小桌子各一张，板凳四条，竹椅一把，闹钟一只，手表一只，棉被五条，绒线衣四件，呢裤两条等。

周道富对目前的生活状况很满意，他自豪地说：“解放了，我们

翻了身，生活过得很好！”周道富一谈到新社会甜，就乐滋滋地笑得合不拢嘴，从内心里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

当孩子去黑龙江时，周道富给孩子进行回忆对比教育。他对孩子说：“在旧社会，我离开家是逃荒，讨饭。现在，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你离开家是到工作单位去，有人欢送你，一到那里，又有人欢迎你，有人关心你的生活。新社会多幸福！”对孩子的上山下乡，周道富自己很愉快，孩子也很愉快。

### 周 见 根

周见根，贫农出身，五十岁，平炉丙班炉前工，中共党员，宝山县庙行公社人。

周见根一九四八年结婚，一九五四年以前，有两个孩子，当时本人工资五十七元五角，爱人工资七十多元，每月总收入一百三十元，全家四人，生活过得蛮好。从五五年到五八年每年增添一个孩子，加上要负担父亲的一半生活费用，全家增到八口半，生活就比较困难了，加之爱人因孩子多，家务重，辞职回家，收入减少。周本人工资虽增到九十元五角，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十一元，还是比较紧；到六二年，原来的储蓄和爱人的退职费全部用完了，当时，即由厂里每季度补助十五元到二十元。到六三年工调时，周的工资增加了五元，按补助标准停止了补助，生活仍不宽裕。

周的长子周伟庆，六四年高中毕业，去新疆农二师劳动，后调工矿工作，已结婚，有孩子，不能补助家用。

次子周龙法，六六届初中毕业后，在本村插队落户，六八年去云南军垦农场工作，每月工资二十八元。三女周美英，七〇届初中毕业，分配去内蒙插队，每年要家里贴她五、六十元。四子周龙兴，七

一届初中毕业，分配在大场医院当药剂室学徒，每月得津贴十九元八角四分。五子周国龙，七二届初中毕业生，在上海第三精神病疗养院工作，工资三十元六角。六女周红英，还在读初中。

周见根的六个孩子有五个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加上爱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做过四年外包工，每月平均收入二十五元，父亲六七年去世，每月少支出六元，生活大大好转。第二个孩子外出工作后，家中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近二十元，六七年起家中又开始略有积余，六九年以后每月可积余三、四十元，到去年已积蓄了一千五百元，正在造六十平方米的楼房，给子女用。

周见根想想过去，兄弟五人，解放前都没有读过书，看看现在，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六个子女都能读上中学，五个有了工作，生活越来越好。他十分激动地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 沈 炊 连

沈炊连，锅炉房普通工，五十三岁，崇明县人。

沈十三岁时，母病无钱医治而死后，到上海学木匠，“九·一八”事变后，回家跟父亲种田。日脚还是度不过，又来上海做工，但工钱几乎都给工头剥削去了。一九三八年，经朋友介绍到吴淞铁路上做了三年小工，平日扛重活，吃麸皮，还经常挨日本鬼子的打，沈受不了，又跑回崇明，农忙时给人家做短工。

一九四五年，沈炊连结婚，和父亲分了家。不久抗战胜利，第一个孩子出世，他带了老婆、儿子来上海，在闸北水电公司扛煤，直到解放。一九五〇年二月，进上钢一厂做临时工，到下半年转正当了铸钢工。

沈进厂后，感到新社会生活的幸福，工人同志间的温暖，工作很

积极，五三年评为四级工，工资六十六元九角，家中四人（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日子过得不错。

后来，他的爱人又连生了三个男孩，最初生活还算过得去，但等到几个孩子背上了书包，就比较紧了。六〇年，组织上曾决定补助他每月五元。他想，自己是在苦日子里度过来的，虽然目前生活困难些，但比解放前不知要强多少倍，只要安排得好，是可以克服的，就主动地向领导反映：“补助给比我更困难的吧，我自己可以克服。”那时，他的大孩子高小毕业没考上中学，就要他去拾煤渣，这样，全家七口，每月只买五十斤煤球就行了。还叫儿子到小菜场去帮忙，将剩下的菜皮拾回来腌腌当菜吃。热天，他爱人和儿子出去割草卖给牛奶场，每星期可得十几元。沈本人在厂里吃饭，每顿只吃五分钱的菜。家住工房，上、下班都步行，将车贴三元省下贴补家用，这样省吃俭用，全家生活过得也还顺当。

一九六五年后，家里生活逐渐好转，长子作为社会青年分到崇明前进农场，每月十八元，贴家三元；三年后三十元，但结了婚，全部自用。次子六七年小学毕业后，分到东海船厂当学徒，每月十八元，贴家里二元，二年满师每月四十二元四角，贴家里二十元。沈的爱人六八年安排做里弄工，每天一元二角。六九年，三子初中毕业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每月二十元。沈本人工资又加到七十二元四角。

近几年来，家里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六〇年他全家从张华浜农村的草屋搬进工房时，只有两张竹床，一个破缸，一张破桌子，两条破被子。几年来新添了被箱、五斗橱、衣服柜各一张，两张板床，一架缝纫机，一只收音机，两只手表。全家七人，有十件毛线衣，十一件毛料衣，三件风雪大衣，棉被仅在家里用的就有十条。六九年起，三子插队时用去二百元，每年回来探亲路费、吃用，一共花去六百元。

两个小儿子读中学、小学，学杂费每年三十元。孩子大了，就业的人多了，经济比较宽裕，但是沈仍坚持勤俭节约。

沈家中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供孩子们阅读。沈本人文盲，虽然去年到车间扫盲班学文化，但识字仍不多，不能读报。他说：“家务事多，要分心，年纪也大了，没有心思学习。”

## 江 恒 余

江恒余，乙班烘矿组组长，共产党员，四十五岁，江苏连云港人。

江祖祖辈辈都是渔民。旧社会，祖父累死在渔船上。江三岁时母病，因无钱医治含愤而死。父亲捕鱼养不活他和姐姐，十二岁时跟父亲逃荒到新浦镇，帮人家卖大饼、油条，生活难以维持，只得将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一九四五年江恒余和父亲跟难民船来上海姑母处，父亲外出拾垃圾，江跟姑父到码头上做小工。

一九五〇年，江由失业工人登记处介绍做临时工，五二年经劳动局介绍进上钢一厂，每月工资四十多元。江恒余激动地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共产党是我们的领路人。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进厂后，工作积极，当上了工会组长，六一年入了党，当化铁炉生产组长。历次运动都积极参加，被称为“老积极”。

五三年，江恒余结婚，住一间草房。评工资时，评为四级工，每月工资六十六元九角，五五年领了一个女孩，平均每人每月二十多元，生活过得很好。五四年到六五年期间先后添了三个孩子。六三年工调时加半级，工资七十二元四角。生活仍过得不差。六五年下半年，因最小的女孩是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治疗用去不少钱，江本人也胃病发作，经济一度紧张。组织上送他到杭州疗养，又给他家补助了五十元。六六年组织上又照顾他爱人做里弄工，每月可得三十元，生

活逐步好转，全家五口，平均每人每月二十多元。几年来，全家新添了手表一只，自行车一辆，半导体收音机、毛料衣服、皮鞋、五斗橱、被头箱都有，一年还可以结余一百多元，一部分用来贴补姐姐、舅舅家里。

## 第二转炉车间 五十六个“海塘青年”的情况调查

上钢一厂第二转炉车间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过的车间。这个车间有五十六个工人是参加过海塘劳动以后进厂的，大家称他们为“海塘青年”。这些青年经过十四年锻炼，目前大多数人已成为车间里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成长过程，为我们教育培养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新一代青年工人，提供了一些经验。

### 从海塘到工厂

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一九五七年初中毕业生，没有考上高中。一九五八年三月，响应市委“社会知识青年去修海塘”的号召，参加奉贤围塘劳动。这些青年的家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四十六人，摊贩、职员、中农五人，小业主、资产阶级五人。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热爱新社会，迫切要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都很乐意参加海塘劳动。

刚到海塘，正当三月初，天气还比较冷，大家住在海滩边，顶寒风，冒大雨，挑灯夜战，连续苦干，经受了海塘风浪的考验，初步培养起吃苦耐劳的精神。至今，他们还这样说：“海塘锻炼实在好，时间不长意义大，锻炼身体炼红心。”在大办钢铁的形势下，这些青年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底进入了上钢一厂。

### 三方面的教育

这些海塘青年在谈到自己成长过程时，都认为父母、师傅、党团组织的教育非常重要。

父母的翻身教育。这些青年，解放时只有十岁左右，对旧社会的痛苦体会不深。父母经常对他们忆苦思甜，从小培养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海塘青年刘其仁的父亲，为了还阎王债，将当时不满两岁的独子刘其仁，卖给富农当“养子”。刘其仁的母亲又被流氓恶霸拐卖去了。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穷人翻了身，才使他一家人得到团圆。另一个周连生的哥哥刚生下来，因为家里付不起接生费，就被人抢走了，至今下落不明。父母的翻身教育，使这些“穷孩子”懂得“翻身不能忘本”的道理，体会到在社会主义工厂里劳动是无比的幸福。海塘青年赵超说：“要不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哪能读完初中进工厂，回想小时候吃豆饼豆渣的生活，如今真是感到非常幸福。”

师傅的纪律教育。这些青年刚进厂时，年轻贪玩。当时分配在化铁炉上的胡建义等四个人，进厂第三天，夜班做到半夜两点钟，人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到，急坏了炉长徐道亮师傅。一直到拂晓五点多钟，这四个小青年来了，笑嘻嘻地对徐师傅说：“我们在平炉车间看出钢，真有力！”徐师傅听了又气又好笑，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指出钢铁工人遵守劳动纪律的重要性，还用两种社会、两种学徒制度的对比，向他们进行阶级教育。这些小青年觉悟提高后，表现都很好。青年柳志峰，在驾驶行车时，闭目养神，结果造成行车上三吨重的主钩坠落，险些造成重大事故。老师傅帮助他对这次事故进行分析，教育了小柳和其他青年。从此，小柳接受教训，十几年来注意安全行车，并且消灭了多次重大事故隐患。有一次，吊包子浇钢，小柳发觉领行车

工把龙门架顶在钢水包轴心上，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了一场翻钢水包的重大事故。

党团组织的路线教育和阶级教育。这些青年刚进厂时，厂里的生产条件比较差，机械化水平低，手工操作多，劳动强度高。炼钢又是争分夺秒的紧张战斗，在炼钢炉前，稍不留意，就会碰伤、烫伤，出事故。当时有些人担心“生活这样紧张，是否吃得消”，也有的怕“烫坏了脸孔，找不到对象”。党团组织就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特别是厂里每年举行的毛主席来厂视察的纪念活动，对大家的教育很深。海塘青年唐正义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来看我们钢铁工人，使我懂得了为革命炼钢最光荣，做毛泽东时代钢铁工人最幸福。”他们牢记毛主席“要好好干，大有可为”的教导，决心在毛主席视察的车间里干一辈子革命。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党团组织经常开展青年突击队活动，对他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帮助很大。那时，转炉生产刚刚上马，技术水平低，炉龄短，炼不上十炉、二十炉，炉子就坏了。为了解决拆炉工作繁重和人手不足的矛盾，青年突击队员在下班后，经常参加拆炉战斗。当“保钢”战斗最紧张的时刻，许多海塘青年往往连续三、四个月不回家，每天干上十几小时。党团组织还特地组织干部和青年突击队员到当时劳动条件最差的制砖房去劳动。制砖房是制造沥青砖的，为了防止腐蚀，脸上手上要涂上厚厚一层油。通过这些艰苦劳动的锻炼，使青年们树立起“越是艰苦越光荣”的思想。许多海塘青年自豪地说：“我们是经过大跃进考验的钢铁工人。”

### 政治表现

在这五十六名海塘青年中，参加过共青团的有三十人，其中十二人

入了党，十一人正在积极争取入党。目前担任正副党支部书记的四人（其中一人最近调厂部工作），担任工长、总工长、值班副主任的六人，担任炉长和组长的十三人，担任车间干部的六人，共二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二。

这些青年的政治表现，大体上可分为好的、比较好的和差的三类：

第一类好的，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批修整风运动，能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站稳立场。这一类有十六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八点五。总工长周念邦，进厂后政治上进步快，两次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毛主席。一九六〇年，买不到《毛泽东选集》，他迫切要求学习，就向别人借阅。一九六一年，刘少奇一伙刮起大砍大杀转炉炼钢的黑风，他敢于同工人老师傅一起，顶妖风，战恶浪，抱着“毛主席视察过的车间一分一秒不能停产”的坚强决心，主动地挑起重担，把炼钒渣中倒出来的低温铁水炼成钢。一九六三年，他组织全组同志学习《毛泽东选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度刮经济主义妖风时，有人动员他领四百九十六元的“补发工资”，还说什么：“历史上革命斗争都是从经济斗争开始。”周念邦说：“不对！同资本家可以进行经济斗争，现在毛主席掌权，你们拿的是人民的钞票。”他还动员其他工人不拿这种所谓“补发工资”。一九六八年，周念邦同一些工人去支援昆明钢厂，那里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就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回上海时，沿途有武斗，为了旅途安全，同志们购买了飞机票，可是周念邦坚持国家财政制度，说服大家退掉飞机票，改乘了火车。

第二类比较好的，能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生产任务能完成。这一类有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百分之六十六。行车组长周炳炎，技术好，肯钻研，还积极组织大家学马列著作，但斗争

性不强，怕得罪人。许林海，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政治上表现消沉，据他自己讲：“进厂不久，就打过入团申请报告，结果无音讯，团组织没有找我谈过，民兵也不能参加。想找对象，人家晓得我这张底牌就吓了。”言毕，摇头不止。

第三类差的，主要是那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犯了较大错误，而目前还缺乏认识的人，有三个人，占百分之五。有个王耀祖，在念书时当过少先队中队副，进厂初期担任过团支委，当过化铁炉青年炉长。一九六〇年受过团区委表扬，登过报，大照片登在光荣榜上。但他的父亲是伪乡长，有血债，一九六二年病亡狱中，他特地搞了一张反革命父亲的画像供在家里，并穿起白鞋，以尽“孝”道；同时还向别人吹嘘“我父亲还是个大八腊子”，“我小辰光冬天还能吃到西瓜”等，这说明他在思想上不能同反动阶级划清界线。在他年龄超过二十五岁时（当时担任团支委工作），团总支动员他退团，他表示不满。“一打三反”运动中，发现他在一九六九年二月的日记中有革命烈士诗抄中摘录的诗一首：“黎明之前黑暗，黑暗之中混乱。世上总有阳光，黑暗毕竟很短。”同年六月又在车间里写黄色诗句，给另一生活作风不好的女同志看。

## 技术状况

经过十四年的劳动实践，这些当年的海塘青年，许多人已成为生产技术上的骨干力量，其中先后担任过炉长和组长的有二十八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

一九五八年，技术工人十分缺乏，有些未满师的徒弟也被推上基层生产领导岗位。这些海塘青年中有六个人，在进厂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也~~担任了炉长或组长。他们挑起担子后，下苦功学习技术，工作

搞得也很出色。

目前在这个车间的炉前、铸钢、行车、鼓风四个主要部门中，共有海塘青年二十八人，其中担任各级领导工作的达十六人，占总人数百分之六十。这些青年，现在都熟练地掌握了炼钢技术。杨耀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杨耀祥有三百度近视，戴上眼镜不方便，脱了眼镜看不清。开始他不安心炉前操作，多次要求调动。党团组织就针对他的思想进行教育，老工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靠五百万吨钢侵略中国的罪行，教育了他，毛主席关于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的伟大号召，鼓舞了他，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在炼钢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他刚当上炉长时，由于技术不过硬，脱氧不完全，引起大沸腾，烧毁了钢包车。从此以后，就更加虚心向老师傅请教，买炼钢书籍看，到兄弟小队去学习，技术水平提高较快。有一次炼三号钢，取样化验合格，杨耀祥根据自己多年操作经验判断，这炉钢不合标准，继续加石灰吹炼。事后证明，确是化验室分析错误。象这样的事，有好几次。在车间“炉前办学”中，杨耀祥还担任工人讲师。

## 经济状况

这些青年的工资原来分四等，彼此差别较大。一级半工（四十五元）三人，二级工（四十九元）三十人，二级半工（五十三元）十八人，三级工（五十七元）五人。据了解，已调出的蒋瑞强曾评为三级半工（六十二元），与最低的相差达十七元。

工调后，二级半工和相当二级半工的三人，三级工和相当三级工的五十二人，另有一人，因犯错误正在处理，没有参加评级。现在，工资较低的有陆大益、柳紫峰、赵超三人，原因各不相同。

陆大益，车工组长，因学徒期间患过肺结核，病假半年，延期一

年转正，一九六三年工调时未评，至今比其他同志低半级。但是，另一海塘青年史新才，连续七年病假，至今没有上班，由于一九六三年他提了级，这次工调又不考虑病假问题，工资比陆大益高。

柳紫峰，行车副组长，因为在一九六三年以前出过行车事故，那次工调没评上，工资一直比其他同志低。另一海塘青年刘其仁，近年来连续发生两次漏钢包事故和一次砸伤人事故，造成很大损失，这次工调仍提了级，工资比柳紫峰高。

赵超，是海塘青年中目前工资最低的一个人。原因是他从一九六二年底起担任了厂校教师，这次按文教系统工资标准，调整为五十一元。不仅比工人低六元，还比同年进厂当干部的海塘青年低四元。工调后，赵比较高兴，因为本人增四元，爱人增加了十四元，家里两个孩子，收入从七十二元增加到九十元。他说：“这次工调，是白开水里加糖，甜得很。”但是他对继续当教师有想法，因为目前已比当工人的海塘青年工资低六元，奖金低一元。他说：“如果下次再搞工调，我按文教系统标准加一级四元，而工人加一级九元。”他还说：“工人辛苦，工资高一点应该，但是差距不能越来越大。”此外，他还担心夫妇两人都是教师，对孩子出身成分有影响。最近赵超下放在电工组劳动，组织上要他再回厂校当教师，多次动员，都不肯去。

工调后，这些海塘青年按家庭人口计算的平均收入情况是：十五元的四人，十六至二十元的十五人，二十一至二十五元的十九人，二十六至三十元的九人，三十元以上的九人。

他们大部分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其原因：

（1）双职工多。已婚的五十五人当中，有双职工四十六人，爱人是里弄工的五人，农村社员三人，农场工人一人。除农村社员外，里弄工每月二十元左右，农场工每月二十七元，市区职工每月在三十至

五十元之间。这次工调，双职工增加收入较多。

(2)父母有工作的多，特别是父母有工作，本人又是独子的“三职工家庭”收入最多，生活较富裕。据统计有七人。独子史康年，本人工资五十七元，爱人工资四十七元，母领退休工资六十三元，两个孩子，加上附加工资，每月收入一百七十七元，按人口平均收入超过三十五元。独子金炳元，本人工资五十七元，爱人工资四十九元，母退休工资五十多元，加上附加工资，家庭收入一百六十六元，两个孩子，按人口平均收入达三十三元。

(3)孩子少的多。在已婚海塘青年中，有一个孩子的九人，有二个孩子的二十八人，有三个孩子的十五人，有四个孩子的二人，无孩子的一人。

这些青年的年纪还轻，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三点七岁，但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十七人，占三分之一，子女人数已显得偏高。

## 附：如何做好犯错误的人的转化工作

二转炉车间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除揪出了个别坏人外，还重点审查了四十七个犯有各种错误的工人和干部。在批判教育帮助之后，分别给予适当的处分或处理。

最近，车间里又新发现有十五人犯有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错误，其中五人正由专政机关拘留和冲击审查中。

我们重点调查了四十七个运动中审查对象和十五个新发现犯有各种错误的人的情况。

### 犯错误的情况

按六十二个人所犯错误性质来看，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犯政治错误的十四人。其特点是“四多”：出身于反革命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多，占七人；临时工多，占七人；年纪轻的多，三十岁左右的占九人；有文化的多，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有十一人。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有的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仍坚持反动立场，妄图变天；有的由于剥削阶级家庭受到冲击而不满，进而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的经历复杂，旧意识浓，对现实不满；也有的家属在海外，向往资产阶级糜烂生活，企图越境。有的出身虽好，造反后忘乎所以，犯了错误；如：贫农出身的陈桂根，在交大附中担任工宣队期间，吃醉了酒，主持会议，语无伦次，呼出了反动口号，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

第二种，犯经济错误的十六人，其中十人的问题在四清运动中



已经暴露，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清队、“一打三反”运动才结案；有六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经济性质的错误。在这六人之中，惯窃犯四人，其中艺徒占三名。艺徒朱耀杰，七〇届学生，进厂后表现坏，上班跑四室（医务室、更衣室、电视室、冷气室），下班打群架，偷东西。钞票、衣服、油、盐、酱、醋、米、煤球等东西样样都偷，还到医院里偷病假单，骗取长病假。朱曾在公安局三进三出。组织上为了挽救他，曾给予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七三年初又因偷窃，被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冲击审查。

第三种，犯生活错误的十六人。除三人是一般生活问题外，多数人错误性质严重。有的奸污幼童或哑吧少女；有的干暗娼活动；有的教养释放后，继续犯罪。青工舒祖暖，是地区里的小流氓，持刀强奸回沪探亲的云南插队女青年。这些犯错误的人，民愤一般都比较大大。

第四种，犯其他错误的十六人。如：破坏机器，制造设备事故；开“地下旅馆”，获取非法收入；唆使青年犯罪，坐地收赃；隐瞒历史，以及严重旷工等等。青工徐天佐，旷工达一百九十多天，支部书记六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小组同志多次登门“请他”，其父也对他进行多次劝导，均无效。

## 目前的表现

六十二个犯各种错误的人，按其目前表现，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好的。这些人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在政治学习、生产斗争中表现较好。属于这一类的有十一人。这些人所以会有较大的转变，党组织用政策思想武装群众，发动群众一起做转化工作，是很重要的条件。例如刺铝工袁德福，现年四十岁，从小沾染流氓习气，爱打群架。他与二个哥哥，解放前在杨树浦一带号称“三老虎”。

五〇年袁由民政局收容，在遣送苏北教养途中逃跑。回沪后，就进上钢一厂，现是六级刺铝工，技术水平较高。长期来，袁恶习不改，动辄打人骂人。四清运动中，审查袁从收容所逃跑这段历史，曾批斗二十三次，袁死不认账。文化大革命中，袁上夜班打瞌睡，连续出了两次浇钢事故，报废几十吨钢，还拒绝别人帮助，说什么：“你们送我到提篮桥改造去好了。”在开展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经过四十余次大小会议，群众对他进行反复帮助，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才开始承认错误。以后，精神面貌有变化。现在，车间里~~领导~~行车缺人，他去，浇钢缺人，他顶，劳动积极主动。最近在抢救一炉钢的战斗中，他负了伤。在家休养时，还买了一套《列宁选集》，在看《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袁德福在转变过程中，思想有过反复，组织上对他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有一次他主动去支援其他小组劳动，工段长表扬了他，一部分老师傅不理解，批评领导：“你们执行什么路线，依靠什么人？”受过袁德福打骂的同志还提出：“你们表扬袁德福，是否叫我再给他撕破一件衬衫？”有的干部听到意见后，也有点担心，怕表扬不当，又要犯路线错误。袁德福看到这种情况，很灰心。他想：犯过错误的人，人家瞧不起，太积极了反而惹是非。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举办了专题学习班，围绕受过冲击的对象有了进步表现该不该表扬的问题，展开大辩论。有些同志原来认为：“过去有罪，现在表现好是应该的，谈不上表扬。”“对犯错误的人，只有管得紧，压得牢，才不会翘尾巴”。通过学习，认识有了提高，曾被袁德福撕破过新衬衫的盛志林说：“我只想到撕破的衬衫，却没有看到人家的进步。”会后，他主动去做袁的工作。党支部副书记高法仁同志，住在医院里，也把袁请去，对袁说：“你不要因为大家有不同看法，产生消极想法，要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正确对待同志，

相信党，相信群众，抬起头来，继续革命。”车间领导同志还上门访问。组织上的关心，同志们的帮助，使袁深受感动。他体会到，过去大家批判他，是为了帮他改正错误，现在大家关心他，是为了拉他一起干革命。目前，袁学习认真，工作积极。

第二类，一般的。这部分人对自己错误有初步认识，但由于思想包袱重，表现消沉。这类人较多，有三十六人。目前，这部分人的对立情绪还没有完全消除，还要做大量工作。有个装包工徐同增，自认为出身好，放松世界观改造，思想觉悟不高。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参加的一个群众组织被冲击后，一个月不上班，还同一些人贴出大字报，搞什么“绝食斗争”，宣扬什么“临时工生活没保障”等错误言论。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对群众的批判帮助，又情绪对立，一再同群众顶嘴，失口呼出反动口号，当场被扭送公安局，扣押审查了六个月。释放后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分配在平板组清垃圾。在劳动中，他思想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装包搞技术革新很感兴趣（他当过好几年装包工），对知心的人说：“我年纪轻轻，有文化，不可能一辈子出垃圾。”另一方面，又怕人家讽刺。因此，在家里偷偷地搞试验。他自己花钱买橡皮泥，做泥芯，还叫爱人请人代绘机械图。后来，他把设计方案交给领导，领导上既不支持，又不回答，他很灰心。特别是有一次他上医务室看病量体温时，医生怕他弄虚作假，不给量口腔，要他量腋下。他认为是对他的污辱，跟医生吵了起来，医生当即批评他：“不要翘尾巴”。从此，他下决心不要再积极，更不要搞技术活。最近，装包子缺人，领导上要他去顶班，他说：“我是戳破了的皮球，泄了气，宁可一辈子出垃圾算了。”

第三类，差的。这部分人对所犯错误缺乏认识，有的还在边教边犯。这类人有十五人，数量不多，影响很坏，领导上对他们也感到缺

少办法。青工朱兴国，曾是少年教养所的释放犯，自幼沾染坏习气，六二年经济困难时期，抢大饼油条达百余次，被送去教养。进厂后，领导上发现他经常与一些流氓阿飞鬼混，曾多次举办学习班，由老工人对他教育帮助。但由于不注意下班后对他做工作，有个和他同宿舍的戴帽坏分子董福根拚命拉拢他。结果，白天我们做他工作，晚上，坏分子拉他下水，他在坏分子的教唆下，奸污妇女，走上犯罪道路。目前正在区文攻武卫指挥部里冲击审查中。

## 几个问题

一、落实政策问题。车间在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问题上，是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和经验的，但是，也存在着缺点。主要是在部分同志的头脑中，政策观念不强，不能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例如，工人卞国勋，运动中作为“富农”审查批斗，本人不承认，一度定为富农分子不戴富农帽子。七〇年二月复查后，改定工人成分。但由于卞对原来的定性不戴帽的处理不服，劳动表现不好，群众对他有意见。因而，拖了二年多，乙班支部一直不宣布复查结论。有一次，有个工人酗酒，被送进了派出所。因为卞曾同这个工人一起吃酒，小组里又开了批判会，还作为“富农分子”对他进行批判帮助。又如党员干部黄群，三八年参加革命时，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四六年土改时，家庭成分下降为中农。六三年整顿劳保卡，将黄母划为破落地主，取消劳保享受。现查明，黄母土改成分确是中农。但在审查期间，黄母病亡，花了很多医药费。黄要求其母临死之前最后一笔医药费予以报销，厂里经办人员说：“政治上已从宽了，经济上就不必再补发了。”问题至今未解决。

二、对屡教屡犯错误的人的处理问题。对于这种人，大家感到头

痛,没办法。青工郑夙凡,六〇年因犯生活腐化错误,受到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最近,郑又重犯生活腐化错误,又给予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老师傅说:“这种处分对郑夙凡起啥作用?”也有的老师傅说:“开除出厂是吓吓人的,到期表现不好,还是开除不了。”

三、管制问题。目前对宣布管制处理的对象,如何实行管制,政策不明确。奸污幼女犯刘克华,七三年一月戴上坏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处分宣布后,群众提出问题:“对管制的坏分子和不管制的坏分子,在专政方面有啥区别?”有些人解释说:“管制是一种刑事处分。戴上帽子,再进行管制,是对戴帽分子的加重处分”。但厂保卫部门的解释恰好相反。他们说:“宣布管制是给戴帽分子一个‘奔头’,管制期满之后可以重新评审。如果表现好,可考虑摘帽。”

## 钢板车间青年工人情况调查

钢板车间是一九七一年新建的一个车间,是全厂技术设备最先进、青年工人最多的一个车间。三十岁以下的青工有六百四十七人,占车间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

这些青工的来源:部队复员的一百五十八人;六六至六八届中学毕业生、经过农村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一百九十二人,七〇、七二届毕业直接分配来厂的知识青年一百九十八人;还有九十九人是从别的车间调来的。

他们的家庭出身:工人三百四十六人,贫下中农五十八人,职员八十六人,小业主及其他九十九人,资产阶级三十人,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二十八人。

他们的文化程度:大专毕业的十三人,高中毕业的五十四人,初中毕业的五百八十人。他们中间,党员三十三人,团员二百三十二人。有五十一人分别担任车间、工段党政工团领导职务的~~五十一人~~。

这些青年工人,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显著提高,在批林整风和生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有些青年有冷热病,高兴时拼命干,不高兴时“攒纱帽”;喜欢听表扬,听不进批评意见,有时明明做错了事,如批评口气稍重些,说理稍不恰当,便不卖帐。

钢板车间领导在教育、培养青年工人的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好的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

## 积极地为青年的成长创造条件

推上去。把青年有意识地推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第一线，使他们在风口浪尖上得到锻炼。复员军人穆克勇，在部队施工中，曾遇到好几次坍方，他都能不顾危险抢救战友。来厂后，在生产上不叫苦，不怕累。但他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开会打瞌睡；写转正小结，动员多次也不写，并说：“写不写，反正三十六只老洋。”后来，党、团支部有意识地把他推到阶级斗争第一线，让他参加批林整风的各项活动，如：写大批判稿，在批林会上带头发言。在一次救火战斗中，他脸部烧伤后，仍坚持顽强战斗，受到了同志们的赞扬。去年十二月他光荣地参加了共青团，并担任了生产小组副组长，表现很积极。

但是，也有一些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没有让他们到斗争第一线去经受锻炼，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复员军人曹中禹，进厂后，工作积极，上进心强，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威信，被选为团支委。团支书想让他负责政宣工作。但有的工段领导却认为政宣工作很重要，担心他挑不起这个担子，没有同意。以后，又指责他对团的工作不积极，不热心。在这种情况下，小曹就抱着“生产工作好好干，团的工作放一边”的态度，表现很消沉。

压担子。有意识地让青年在各种工作岗位上挑起革命的重担，使他们从游泳中学会游泳，增长才干。团总支副书记姚慧英，六七年进厂，在平炉车间当开炉门工，任团支部副书记。调来钢板车间后，车间党总支看到她有活动能力，就让她负责民兵、青年等方面工作。去年四月，又让她担任团总支副书记。当时，乙班团支委闹不团结，对团总支工作意见也较大。党总支决定让小姚去处理这个矛盾，一面鼓励她敢于负责，一面帮助她研究工作方法。她到了乙班后，与团支委

谈心，主动检查了工作缺点，启发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帮助团支部委员消除隔阂，加强团结，小姚也得到了锻炼，进步很快。去年十一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也有一些青年往往因为领导对他们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当，使他们长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操纵工戴锦陶，家庭出身工人，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六八年到崇明农场，工作一贯积极，任过副连长，写过入党报告。七一年十一月进厂后，即任新工人学习班班长，有一定组织能力，在群众中有威信。团的总支、支部成立时，群众分别推选她为委员候选人，但由于领导上考虑不周，没有让她当选。这件事引起群众议论：“小戴是不是犯了错误？”她也感到压力很大，领导又未及时找她谈心。八月间，党支部宣布小戴担任生产组长。不久，又因工作需要，调去搞“工调”，并指定另一同志暂代组长，可是，当她搞完“工调”回到小组时，领导从未提起此事，使她感到好象组长又被取消了。现在，领导虽然仍认为她是骨干，但实际上并未给她什么工作做。

带上路。老师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正确，对于青年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甲班有个青年的钥匙，被一个犯过投机贩卖错误的师傅拾到藏起来了。当小青年在找钥匙时，他就说：你要想找到钥匙，就得拿点“刺激”（香烟、糖果）来。为了急于开锁，这位青年只得去买半包大前门香烟、半斤糖果去“刺激”他。老师傅的错误做法，给青年们带来很不好的影响。此后，这个组里藏东西、要“刺激”成了风，吓得有些青年不敢再把东西放在更衣室里了。党总支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老师傅究竟把青年往什么路上带的问题。就发动老工人讨论：应当怎样以身作则，把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传给青年。现在，大多数老工人都自觉地通过身教和言教，把青年带

好。例如：丙班团小组长汤志勤，感到自己年纪轻，做家庭访问工作有顾虑。老师傅钱德章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带着他一起到青工家里进行访问，一起找青年谈心。通过这样的活动，小汤逐渐取得了工作经验，提高了工作信心。现在，他已能主动深入青年群众中做思想工作，进步很快。

### 对中间、落后青年要热情关怀，正确领导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批林整风中，车间党支部对中间、后进青年，注意多做耐心教育工作，正确引导，使这一批为数众多的青年的积极因素得以调动，不少青年进步较快。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只看他们的消极一面，看不到他们的主流和本质，总认为“只有整一整才能解决问题。”下面就是车间在教育中间、落后青年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

例一：董鹏明，七〇届初中毕业生，在学校里就是有名的“小荡”。进工厂后，唱黄色歌曲，打群架，生产上屡出操作事故。虽经多次批评教育，仍无转变，成为车间里有名的“三老”（老检讨、老不改、老再犯），群众对他是“三气”（看他行为生气、听他名字惹气、做他工作泄气）。车间领导也曾想将他开除出厂了事，还两次打报告要求把他送去劳动教养。通过这次批林整风，党支部进一步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了教育青年的责任感，开始对董鹏明犯错误的原因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到他小时由于经常挨父亲打骂，因而成天在外游荡，交上了坏朋友，开始沾染上流氓阿飞习气。党支部决心改进工作作风，由党支书亲自带他到骨干力量比较强的升火组劳动。到了这个小组，老师傅热情欢迎，经常找他谈心，到他家里访问，和他母亲配合进行教育，还让他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去，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他在党

支部和老师傅的启发教育下，揭发了一个“惯窃”。而当他稍有进步时，又立即对他进行表扬。经过这样三个多月的不断教育，他提高很快。一次检修炉子，他争先冲进四、五百度高温的炉子里，受到了老师傅的赞扬。

例二：复员军人徐潜，工人家庭出身。一九七一年进厂后不久，被选为团小组长，当时工作表现一般。后来他开始讲究穿着，工作自由散漫。去年夏天，他和别的几个青年到附近农田捉蟋蟀，偷吃甜芦粟，当场被社员抓住，徐则溜了回来。后来，社员表示：只要厂里领导来处理，就可以把他们放回。当时，他们怕问题闹大，就相互商定，由徐充当团的领导干部去办交涉，把他们保回来了。后来，车间党支部发觉了这件事，先后召开了两次群众批判会，会上，给他戴上“冒充领导干部”、“破坏工农联盟”两项帽子。事后，也没有帮助他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这样，他没有能够正确吸取教训，学习没劲、工作消沉，而且追求穿着的缺点更加发展。许多青年见此情况，也颇多议论，说领导作风粗暴，是“小题大作”。

车间里也有一些干部，以为只要对青年多加表扬，就可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工作做好。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往往走向反面，影响了青年的进步。

例如：轧钢操作工郑学栋，进厂时，积极要求进步，工作肯钻，有闯劲。他的缺点是：骄傲自满，听不得批评，有人表扬他，积极性就很高。领导上了解他这个弱点，不但不去帮助他提高，反而一味表扬。一会儿在大会上表扬：“郑学栋带头排除故障”，号召青年向他学习。一会儿又对他父亲说：“你儿子是一块‘纯钢’，只要再捶打几下就可以了。”后来，小郑看到和他同时进厂的青年不少已经入党、入团，他入团的要求更加迫切。开始，他以为入团已经没有问题，但一批一

批宣布名单，都没有他的名字，他很苦闷。他听到有人批评他“摆老资格”，以为是当行车指挥吹哨子多了，就不敢多吹哨子，工作上也谨小慎微，不敢大胆负责。回到家里，母亲也怀疑他在厂里表现不好，他难过得说也说不清楚。在车间里也可以听到一些青年对领导这样的意见：批评就是单纯的批评，表扬就是单纯的表扬，缺少一点辩证法。有个青年还说，“我们这些人，好象鸡蛋一样，不是被放在冰箱里，就是被放进汤锅里，怎么能孵得出小鸡来？”

## 附：钢板车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情况

钢板车间共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二十八人，占车间青工总数的百分之四。他们的父母政治情况是：地、富五人，反革命分子十五人，坏分子七人，右派一人。他们的年龄，最大的二十九岁，最小的十八岁，平均二十二岁半。

这些青年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政治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有一定的认识。他们大多数愿意背叛反动家庭，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人已经参加共青团，一人担任生产小组长。但大多数又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倒霉思想，抱着政治少过问、工作好好干、免得找麻烦的态度。对自己的前途考虑较多，对入党、入团感到高不可攀。

这二十八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政治表现好的和较好的有二人，政治表现一般的有二十二人，政治表现差的有四人。

### 表现好的和较好的

主要表现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能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注意自身世界观的改造。检验工沈薇薇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她今年二十五岁，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曾在崇明农场锻炼三年，一九七一年一月进厂，八月加入共青团。她父亲是混入工人队伍的地主分子。一九六六年初，沈薇薇还在学校读书时，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当时，她听姐姐说，年幼时有人叫她姐姐是“小地主婆”，她听了这个情况，立即向父亲追问来历，她父亲被迫

说出了地主身份。沈薇薇经过思想斗争，向组织汇报了真实情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来抄她的家。她主动配合，将剥削财物抄出交公，并且当晚就搬到学校去住。第二天，还在里弄里贴出揭发父亲剥削罪行的大字报。当父亲被遣送回乡时，她从家里只拿四卷《毛泽东选集》回来。到了农场后，她一度埋怨自己投错了胎，情绪有些消沉。后来，学习了“六厂二校”经验，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指示以后，鼓舞极大。从此，她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三大革命斗争。当她听到一个批斗对象悄悄地唱什么“盼星星，盼月亮，只盼妈妈救我出火坑”时，就面对面地进行了揭发和斗争。不久，她当了基干民兵。有一次，在拉练途中，她当卫生员，为了抢救一个溺水的贫下中农小女孩，她口对口地把小女孩食道内的脏物吸出来，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称赞。有人问她：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她说：“别人用十倍的努力改造世界观，我要用二十倍的努力！”

### 表现一般的

这部分人有革命的要求，认为“先天不足，后天不能失调”。但他们包袱较重，“说话、做事腰杆子不硬，还是老老实实、处处小心为妙”。因此，思想反复较多，进步不显著。这类人数较多，其中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政治上要求进步，但对反动父母藕断丝连，感情上割不断，思想很矛盾。在工作上往往是忽冷忽热，反复较多，前进步伐不快。

检验工陆一霞就是一个典型。她高中毕业后，先到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一月进厂。她对父母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有一定认识，愿意向组织上暴露思想，也敢于对不良现象开展批评、斗争，学习和工作表

现都较好。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写大字报揭发了父母罪行，但她看到同学们都疏远她，不让她参加红卫兵串连。她要求入团，不但得不到鼓励，有人还要她检查入团动机，问她是不是想混进团内？她感到前途都被父母毁了，一度情绪极为消沉，走在路上，甚至想过还是让车子撞死了事。后来，让她参加了造反组织，她开始积极起来了。在农场劳动期间，分配她在炊事班工作，她很高兴。有了进步表现，又受到了表扬。进厂初期，领导上给她做一些工作，拉练途中还当炊事班长，她感到领导上这样信任，工作就更加来劲了。同时，她也经常想到党对反革命父母处理的政策。陆的父母虽然解放前都是特务，但母亲表现不好，解放后还攻击党，被管制三年。父亲能坦白交代反动历史，认罪态度较好，没有戴帽，还领退休工资八十多元。这使她体验到：家庭出身选择不了，道路可以选择，只有背叛反动家庭，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她对母亲还有感情上的联系，还不能做到一刀两断。去年七月，母亲病重，她难过得掉下眼泪。母亲死时，她想到母亲的反革命罪行，恨她给自己背上一口黑锅，心想：这种人死了跟死一条狗一样。所以没有流泪，也不戴孝。上午断气，下午就送火葬场，骨灰也不要。可是事情过后，她又后悔，对别人说：“我妈送走时身上还有点热气，我疑心她没有死。”后来，经过组织上对她帮助教育，她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提高了觉悟。沈薇薇入团，她很羡慕，也想争取入团，但想想自己条件不如她，又悲观失望。她就是经常处于这样一种思想矛盾状态之中。

还有一种是工作上勤勤恳恳，但争取进步的信心不足。平时小心翼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检验工邓良芝就是其中的一个。邓父是反动会道门骨干，一九五四年被捕判刑七年，一九六〇年在劳改中病死。母亲是资方代理人。

邓初中毕业后，一九六八年分配在崇明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一月进厂。她进厂后要求进步，工作负责，读书看报比较认真。但平时沉默寡言，年纪轻轻，活象个小老太婆。

在中学期间，比较活跃，写过入团报告。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出身不好，不让串连。她想不通，哭过好几次，只怨自己投错了胎。在农场没让她参加基干民兵，她更怨恨反动父亲害了她。她对人说：“反动家庭出身的污点抹不掉，要象沈薇薇那样又赶不上。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在农场时，她写过入团报告，但放在口袋里，犹豫好多天没有勇气交上去。到了厂里，看到沈薇薇入团，触动很大，想想自己年龄还小，为什么不能争取？当一想到车间还有那么多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没有入团，又泄了气，不敢提出要求。

### 表现差的

这一类的特点是：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政治上不要求进步，工作上马马虎虎。

检验工戴佩兰，二十四岁，父亲因贪污，劳改四年，现留场劳动。她于一九六八年到农场，一九七一年一月进厂。她进工厂以后，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要过问政治，安安稳稳过日子。”她给弟弟写信，也要他“生活多做一点总没有错，闲事要少管，还是太平一点好”。她对老师傅处处奉承，从来不提意见，人前只讲好话。平时开会从不发言，但“工调”评到原小组长时，她却竭力为这个工人说好话。由于她能够拉拢一部分落后群众，因此，当她工作出了差错，受到组长批评时，有些工人却为她辩护。

### 几个问题

这个车间党组织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不少干部对这部分青年的教育重视不够。有的说：“对出身好的青年工作还做不完，哪里有时间去抓这些人的工作？”有的错误地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敢接近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担心重犯立场、路线的错误。具体的表现有：

(一)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关心、不研究，不对他们提出具体的要求。只要他们不犯错误，不出毛病，过得去就行了。根据我们了解，这些青年十分关心领导上对他们的态度。去年八月，沈薇薇被批准入团，在出身不好的青年中震动很大。最近，市委负责同志到厂里开座谈会，让沈薇薇参加，大家也很关心。会上，领导同志对沈说：“你们是党的儿女”，沈十分激动，流下了眼泪。会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去向沈打听，沈也向她们一个一个地传达，她们听了也激动得流泪，表示要争取上进。这说明，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去做工作，这些青年多数是可以教育好的。

(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敢沾边，不敢培养使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展沈薇薇入团。事先，团总支已经先后开过三次会，进行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但团总支书记签字后，三个晚上未睡好觉。他还对人说：“准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再挨斗。”后来，入团报告送到团委，团委也不敢批，一直等到上级党委表示了态，才批准。

(三)对他们应该怎样使用培养，都没有认真研究。不少同志宁“左”勿右，不敢分配工作给他们做。沈薇薇刚由检验站党支部提名调到车间当广播员时，党总支并未反对，后来了解她家庭出身不好，有些同志就不敢用她了。沈察觉了这个情况，也产生了顾虑，要求回班



组，车间领导就来个“顺水推舟”，让沈回工段去了。有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背后议论说，党的政策我们坚决相信，就是不知道基层领导执行得怎么样？

## 大专毕业的知识分子情况调查

上钢一厂有大专毕业的知识分子七百多名。我们调查了其中的五百名。他们的年龄：五十岁以上的十四人，三十至五十岁的三百十人，三十岁以下的一百七十六人。他们当中，男的三百八十五人，女的一百十五人。党员三十人，团员八十三人。

他们当中，按学校的性质来分：大学毕业的三百四十四人，专科学校毕业的一百五十六人。

按毕业的时间来分：解放前毕业的十四人，其中十三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还有三人有严重政历问题。

解放初到一九六五年期间毕业的三百零五人，其中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一百八十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四届和六五届毕业的大部分参加过城乡四清运动。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期间毕业的一百六十六人，其中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一百二十八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内有党员十人，团员四十二人。

一九六九年以后工人大学生毕业后回厂的十五人，其中在上海医学院“红医班”学习一年后回厂担任医务工作的五人，复旦大学“五·七”文科试点班学习三年后回厂在政宣部门工作的二人，其余在生产、技术部门劳动或工作。

### 精神面貌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工人和干部反映知识分子中有四多：摆

架子的多，骄娇两气多，“三脱离”的多，成名成家思想多。经过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起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同工人打成一片，出现了一批受工人欢迎的知识分子。北京钢铁学院研究生、共产党员李任祥被工人称赞为：“第二个钮柏祥”(钮是该厂在试验新炼钢法中牺牲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得好)。小李一到工厂，就分配在炉前当操作工，开始思想上有些“疙瘩”，认为“侧吹转炉是淘汰的东西，没有什么前途”，不大愿意去。刚去劳动时，又碰到高温季节，整天干得腰酸背痛，汗流浹背，实在有些受不了，思想动摇。后来，他看到年近半百的老工人，还带病在炉前操作，自己虽然读过十几年书，却一炉钢也炼不出来，还想调走。这样一比一想，才开始懂得了：“三脱离”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从此，他放下架子，冒着高温，虚心向老师傅请教，从最简单的操作学起。他的脚坏了，忍着痛扛起上百斤重的氧气瓶。脸给钢水溅伤了，脱掉了一层皮，他就用毛巾把脸包起来，继续战斗在炉前。哪里有重活，就在那里干，他不怕烫，不怕苦，经过整整四年的锻炼，逐渐培养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后来他担任副炉长，还积极参加“炉前办学”，认真总结老师傅的操作经验，向工人讲技术课，老师傅很欢迎。

(二)注意改造世界观，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原中心试验室化验组组长邹邱，地主家庭出身，剥削阶级烙印比较深，她怕脏怕累，许多事情都不肯亲自动手。她养过五个孩子，连一块尿布也没有洗过。一九六八年下放到托儿所劳动，开始，她不肯洗有屎的布。后来，她看到大家不仅争着洗有屎的布，而且利用工作之余，为支援生产工人多炼钢，炼好钢，千方百计拾废钢，使她很受感

动。她在大家的带动下，也主动找脏活、重活干，劳动观念加强了，同工人有了共同的思想感情。最近，她调回化验组工作，大家反映她的工作态度和过去大为不同了。

中心试验室技术员陈亚森，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过去他好吹，把自己说成“样样会、事事懂”。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群众的批判帮助和劳动实践，思想作风有很大改变。有一次，他接受改装电导碳装置的任务，主动到炉前征求工人和化验员的意见，改进原来的设计方案，做出了成绩。在工作中，他还主动把自己看到的和藏在家里的有关资料，拿来供大家参考。

(三)把自己的技术理论知识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在生产中有所发明创造，做出了贡献。如技术科技术员梁桑松，在劳动中，看到转炉料场秤料劳动强度高，就同工人一起，改装了四台电子秤，接着他又把车间龙门吊上的秤全部改成电子秤，工人劳动强度显著减轻。不久以前，技术科几次要把他调回去，工人都舍不得放。

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以后，消极起来，说：“干不干，五十八(工资五十八元)，学不学，一个样。”有些人工作之余“烧烧小菜，喝喝老酒，抱抱孩子”。还说：“顶好忘掉我读过大学”。个别技术人员对下放劳动情绪对立。如原技术科技术员赵献武，是国家培养她读到大学毕业的孤儿，但进厂后，逐渐沾染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讲究穿着打扮，对下放劳动一股怨气，把几年来收集的耐海水腐蚀钢资料藏起来，不肯交出。最近厂里要冶炼这种钢种，领导三次找她谈话，她说：“要我上来干可以，要我交出资料没有了。”

### 落实政策的情况

目前，全厂已有二百九十九名知识分子(包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 陆续从下放劳动的岗位调上来担任生产、技术、教育等工作, 占大专毕业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目前已使用的, 以一九六五年以前毕业的为最多, 有二百二十八人, 占这部分知识分子(三百十九人)的百分之七十。从目前担任的工作和所学专业对口的情况来看: (1)工作与专业对口, 本人思想较安定。(2)劳动与专业不对口, 但本人对劳动已经适应, 不愿再干原来专业。如炼钢技术员苏振华, 患麻疯病, 已治愈, 分配在电工组绕线圈, 她认为现在的工作和本人健康状况比较适应, 不愿再到炉前去工作。轧钢技术员谢冰清, 患了心动过速症, 分配在钢板辊体装配组管图纸和备件, 她也表示:“不想再当技术员。”(3)劳动与专业不对口, 本人认为分配的工种不适应, 意见较多。如二转炉车间炼钢技术员周肇兴、廖亭泉, 下放到炉前劳动, 反映吃勿消、干不了, 后安排扫垃圾, 挖防空洞, 很不满意, 说:“下放劳动已四年多了, 专业快要忘光了。”

一九六六年以后毕业的使用较少, 有六十一人, 占这部分知识分子(一百八十一人)的百分之三十四。由于当时分配进厂时, 按规定是作为一般劳动力分配到车间的, 因此, 工作同所学的专业不对口的情况比较普遍。据对一百二十人的统计: 目前工作与专业对口的四十四人, 不对口的有七十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据他们反映: 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毕业于的大专毕业生, 一般都已学完了基础课和主要的专业课, 有一定特长。如科技大学一九六七年毕业的林建伟, 学过原子物理, 分配当造型工已经四年。最近, 听说他的一个同学分配到钢铁研究所去了, 很羡慕, 说:“不知我什么时候能用上自己所学的专业?”平炉和铸造车间有两个六六、六七届外语学院毕业生, 原是留校教师, 现在作一般劳动力使用。还有个学篮球专业的毕业生, 分

配当造型工, 厂里为了“发挥”他的专长, 让他参加厂篮球队。

从上钢一厂的情况看来, 要使知识分子所学专业与工作对起口来, 在一个基层单位里是很难做到的。他们的意见是: 凡是在这几年下放劳动中表现较好, 并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 应分配做与其专业相接近的工作; 部分表现较差, 无一定业务能力的人, 也要分配他们到与专业相接近的生产部门继续参加劳动, 这样, 更有利于对他们的教育、改造。

还有少数华侨知识分子, 在下放劳动中提出的问题, 很多都涉及党对华侨的政策。但基层党组织对此注意不够, 有些问题则无法解决。如: 生产科运输部门有个外语学院毕业的归国华侨梅国胜, 他姐姐已入法国籍, 嫁给一个法国外交官。梅国胜归国读完大学, 当了四年小火车装卸工, 很不满意。去年夏天, 他姐姐回来探亲, 他想出国, 但没有同意, 最近, 他姐姐又连续来信, 要他出国。对这类事, 基层可以做一点工作, 例如, 进行说服教育, 适当调整工作岗位(现在还没有做)。但要真正发挥他的专业作用, 还要有关部门统一研究解决。

## 几个问题

(一)对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有些同志只看到他们缺点的一面, 认为:“知识分子不起副作用已经蛮好了”, “对他们无所谓落实政策的问题”, 因而不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有的车间干部只从本部门需要劳动力出发考虑问题, 技术部门要调技术人员做技术工作, 他们就不答应, 或者拿劳动力去换作为调出的条件。

(二)对技术人员的统一管理问题。目前, 工厂对技术人员的管理, 一九六六年以前毕业的属组织部门管理, 一九六六年以后毕业的

属于工人编制，没有专门部门管理。甚至全厂有多少人，专业是否对口等情况都无人知道，组织部门和劳动工资部门相互推诿。这种情况不改变，对如何进一步培养、使用知识分子，发挥他们作用的工作就很难开展。

(三)阅读技术资料问题。目前，普遍反映技术资料看不到，借阅手续烦琐。文化大革命以前，厂里原有科技阅览室，但至今未恢复。厂外虽有上海图书馆和科技情报站有国外资料可借阅，但查阅一次，要开一次介绍信，很不方便。科技站虽然经常放映科技影片，但票子一般发给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很少机会看到。技术人员对看技术资料、看科技影片的要求比较强烈。